

图经书纬、相错成文

马凌 大学教师,上海

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、如何运作,这是台湾历史学家邢义田长久关注的课题。为了研究的需要,20年中他花了不少时间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资料。在他看来,汉代画像石、画像砖与壁画生动地反映了地方官僚的集体心态和价值观,也反映了一个在文献中见不到的汉代社会。布克哈特曾说:“只有通过艺术这一媒介,一个时代最为秘密的信仰和观念才能传递给后人,而只有这种传递方式才最值得信赖,因为它是无意而为的。”但是,中国素有“言为心声”的观念,正统史学界对图像并不重视,邢义田将自己有关汉代画像的17篇论文辑佚成册,名之为“画为心声”,显然有为图像研究方法正名的意图。

不可不察的是,虽然史学界整体上不重视图像,汉代史的领域却是个“例外”,汉代画像研究近六十年来佳构迭出、成绩斐然,国内有曾昭燏、常任侠、李发林、孙机、俞伟超、信立祥、蒋英炬、吴文祺、郑岩、杨爱国、李淞等,海外则有费慰梅、巴卡霍芬、杰西卡·罗森、包华石、曾布川宽、林巴奈夫、巫鸿等。有关汉代画像的内容、榜题、布局、功能、史料性质,均有论文及论著行世。邢义田对这些中外论著无疑是熟悉的,《画为心声》所收的两篇书评对巫鸿的《武梁祠》、蒋英炬和吴文祺的《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》、信立祥的《中国汉代画像石研究》分别作了不可谓不细致的批评。邢义田在序言中提及,“这些年,陆续读了不少和汉代画像有关的中外论著。他们的解读和论证有些不免捉风捕影”,继而他表示,“试图找出一套令自己心安、也足以说服他人的图像解读方法。”

这个解读方法说来并不玄虚,邢义田一直认为,依据“格套”和“榜题”是解读画像寓意的较为可靠的出发点。他认为,1912年德国汉学家劳费尔(Berthold Laufer)最早提出汉画格套问题,“格套”对应的英文是“fixed ready-made models”,令人联想起另一位德国汉学家雷德侯所提出的“模件”。1990年,邢义田指出造型艺术上的“格套”有三层意义:第一,利用模印、模板重复刻制,或利用粉本图谱依样画葫芦。第二,特定造型的定型和重复出现。第三,一定形式的画面结构,包括一定的画面要素,以大致一定的要素间的相对位置,构成象征特定意义的画面。越十年,他在2000年的论文《汉代画像中的射爵射侯图》里进一步指出,解析“格套”的基本工作是确立图像构成的“单元”(unit),分析构成图像单元的“元件”(elements),区分其中必要、次要和非必要的部分。格套的运用有灵活性、画面的寓意有多重性、墓葬和祠堂的图像还有拼凑性,所以,“格套”辨析方法有一定的限度,并非万能。同年,邢义田在另一篇论文《古代中国及欧亚文献、图像与考古资料中的“胡人”外貌》中,指出“格套”或有图像与事实、图像与文献之间的差距,在某种意义上,“格套”并非反映现实、却符合社会的集体记忆。到了2004年修订的《格套、榜题、文献与画像解释》一文里,邢义田对“格套”做了最为全面的说明:

“格套并不是一套单一、固定不变的形式框架,而是最少包含概念、空间和时间向度,兼具规范作用,又允许相当程度形式甚至内容变化的制作习惯或依据。它们是画像制作者和需求者之间长期互动下的产物。所谓概念向度包括当时的人在哪些概念的指导下、使用哪些‘类型’的画像去装饰墓室或祠堂;这些画像在流行风气的影响下,又以哪些基本构图元件的组合和形式,来传达必要的意义讯息等。空间向度是指不同地域的流行风尚和作坊集团,使得同一寓意的画像在不同地区可能有不尽相同的表现;也指如何将不同类型的画像安排在祠堂或墓室不同的空间、以及在各空间内的画像安排等。时间向度则指某一区域不同时期的画像题材、技法和风格变化等,小而言之,也指题材故事在时间情节上的选择等。”

显然,邢义田并非理论高手。他的“格套”概念试图打通制作、传播、接受三环节,综合形式框架、制作习惯和社会风尚,并兼顾规范与演化。但是,在概念、空间和时间三个向度之下,似嫌陈旧过高、宽泛芜杂。特别是在他在行文中多次使用“粉本”、“蓝本”、“程式”、“格式”、“元件”、“母题”等既定概念,但是缺乏界定和整合。他坦陈未曾受过艺术史的训练,估计也未曾接触符号阐释学。但是,邢义田的确是史学大家,有关“孔子见老子图”、“射爵射侯图”、“捞鼎图”、“七女为父报仇图”、“胡汉战争图”的分析,广征博引而又抽丝剥茧,颇多胜解,开人眼目。以“七女为父报仇图”为例,这是一个早已失传的汉画题材,最早从题榜中有所发现的,是山东的苏兆庆、王思礼、杨爱国等学者。邢义田在此基础上,先是罗列六处祠堂或墓室上的类似画像,进而考证汉代“复仇”观念,援引文献涉及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汉书》等正典,也有颇多民间文学和野史轶闻,最后则立足于性别观、家庭观和社会心态。如果说,作者的出发点是“以图证史”,最后却是以复原情境实现了“以史解图”。在此,不得不提及邢义田的《秦汉史论著系列》煌煌四卷,《画为心声》之外尚有《治国安邦》、《天下一家》和《地不爱宝》,没有腹笥满盈,怎得别开生面。假若用譬喻的话,邢义田的“格套”论颇似工艺粗糙的板斧,李逵抡着这板斧三招能胜,因为功夫在工具之外;而没有深厚学养的人们,腕弱思浅,只怕连举起这板斧都乏力了。

我个人以为,《画为心声》一书中最能给人启迪的,倒不在精雕细刻的考证,而在于高度的自我警醒。8年前,缪哲针对荣新江的《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》和姜伯勤的《中国袄教艺术史》,准确指出“以图证史”的一个常见错误:图像往往有其保守性,匠人爱守旧的程式,有时落后于时代数百年。所谓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、“尽信图不如无图”。邢义田深谙斯理,他不仅小心区分画工与画家,也不忘通盘考虑士人缙绅的文字传统与乡人野老的口述传统、经典的权威与工匠的自由、普遍的模式与地方的特殊。概言之,邢义田对“一致”“全盘”乃至自己钟爱的“格套”,时时处处谨慎小心,不想落入“过度诠释”的陷阱,这才是大家之为大家的风范。

“S ī m ā l ī 为荨麻林”并非伯希和首倡

高山杉 学者,北京

8月初到北戴河避暑,随身带的书里有日本蒙古史学者、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所著、台湾周俊宇先生翻译的蒙古史通论性著作《忽必烈的挑战——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》(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)。此书于1995年4月由朝日新闻社初版,原名《忽必烈的挑战——蒙古迈向海上帝国之路》,为“朝日选书”系列之一。2010年8月复由讲谈社再版,收入“讲谈社学术文库”,并改题今名。汉译本即据此再版本翻译,2012年9月由台湾“广场出版”刊行,我所读者即根据台湾版引进的简体字中文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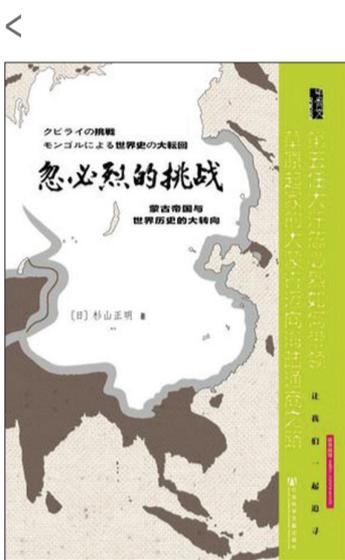
从北戴河返京前,正好读到学者罗新在《上海书评》2013年8月11日号上发表的关于《忽必烈的挑战》的书评《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?》。罗新在文章里特别提到,杉山正明“喜欢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古元史的重要性,特别是波斯文,用杉山正明的话说,对研究蒙古元史而言,波斯语文献与汉语文献同样重要”。这让我想起了前年在北京大学从某友人处听到的一件耸人听闻之事:杉山正明发现了伯希和(Paul Pelliot, 1878-1945)不懂波斯文的证据。根据我研读伯希和论著的经验,当时就觉得“东方学大可汗”似不可能伪装成懂波斯文的样子滥等学界多年始终未被人发现。但友人非常熟悉日本学术界的情况,看他言之凿凿的样子,似乎绝不是空穴来风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所以这次读《忽必烈的挑战》时,就特别留意杉山关于伯希和的评论。

罗新的文章说杉山颇具“理论勇气”,熟悉社会科学的各种新理论,著作多有“独特视角”,可见他不是伯希和那样的历史语文考据家。但是总的来说,杉山对伯希和这一类的学人还是尊重的。他在《忽必烈的挑战》“后记”里说:“作为近代学术的历史研究在欧洲开始已经将近150年。其间,以领导了亚洲历史研究的俄国学者巴托尔德(Vasily Bartold)、法国学者伯希和(Paul Pelliot)为首的,被称为‘巨匠’的历史学者们,致力于蒙古帝国与其时代的历史研究。其深厚与传统是出类拔萃的。”(第275页)不过,由于杉山这本书写成于赴美研修期间,所以不免对于“没有确认原始典籍就靠记忆来书写的部分感到不安”。有这种不安感还是对的,因为他正好就在一个同伯希和有关的问题上犯了错。

在汉译本第139-140页,杉山正明提到波斯文拉施特《史集》曾提到在从大都(今北京)西北行赴上都(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)的路上有一名“S ī m ā l ī”的城市,城内居民多为撒马尔罕人,而该城实即《元史》等汉文典籍中所见住有“回回人匠三千户”的“荨麻林”(也写成“寻麻林”),明朝时改称“洗马林”,今址在北京西北万全县洗马林镇。杉山正明认为,将“S ī m ā l ī”勘同作“荨麻林”,为“法国东洋学的硕学伯希和”提倡于“数十年前”,“堪称卓见”。他意中所指,应是伯希和发表于《亚洲报》1927年刊下册的札记《荨麻林》。该文有冯承钧汉译,收进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译译丛》第三编。

重读伯希和此文,我们会发现最早提出拉施特《史集》的“S ī m ā l ī”即《元史》中的“荨麻林”这一“卓见”的并非伯希和,而是俄国汉学家布莱慈奈德(Emil Bretschneider, 1833-1901,汉名贝勒)。伯希和自己是这么说的:“……布洛赛(按:指法国东方学家、拉施特《史集》校译者Edgard Blochet)曾假定此城(按:指S ī m ā l ī)的对音是‘西八里’,可是从来未有此类城名。布莱慈奈德在他以前早已经说过,此S ī m ā l ī只能是现在的洗马林,此地就在长城之内,张家口之西约30余公里。布莱慈奈德又曾将此现代的名称同《元史》(卷九四)所著录的荨麻林名称供对比。”伯希和的论文不过是比布莱慈奈德从史文中搜集了更多的“荨麻林”语例,并从音韵上详细阐明“S ī m ā l ī”之所以对应“荨麻林”的理由而已。伯希和所引布莱慈奈德之说,见于其所著《北京及其附近之考古的及历史的寻究》(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es on Peking and its Environs, 1876;伯希和所引为法文译本)。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因为看了伯希和的《荨麻林》,还特意从国家图书馆借出布莱慈奈德这本书,打算按照它来踏查北京周边的一些古迹。

罗新的书评还提到:“据说杉山的办公室就是蒙古元史研究的最佳图书馆,参观者通常会惊骇于如此丰富、如此稀见的多语文史料竟会汇聚在此,也难怪杉山会在书中对哈佛的图书馆颇有微词。”我想哈佛图书馆不怎么样,刊有《荨麻林》的《亚洲报》应该还是有的,“理论勇气”和“独特视角”固然可贵,但引文检核的工作是时刻都不能放松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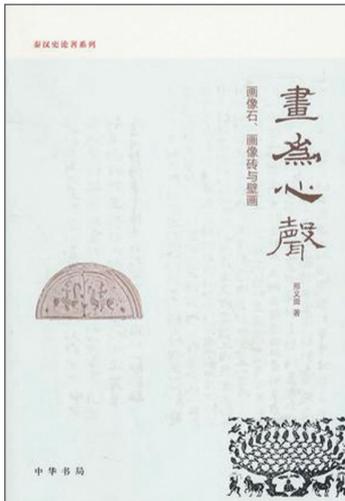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忽必烈的挑战——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》, (日)杉山正明著,周俊宇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版,45.00元。

延伸阅读



《大漠:游牧民族的世界史》, (日)杉山正明著,黄美蓉译,台湾广场出版2011年12月版,新台币500.00元。



《画为心声:画像石、画像砖与壁画》,邢义田著,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,88.00元。